

海上记忆

# 从控江新村溢出的水流

■ 本报记者 沈轶伦

如何区别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节日?有时,亮几盏灯就够了。

黄昱宁幼时,家住杨浦区控江新村,家对面就是上海光学仪器厂。遇到节日,有时厂里会把厂区内所有的灯都打开。家长抱着小黄昱宁去看灯。周边的居民也都如此。围着工厂,大人孩子们的眼睛和脸都被照亮,大家一起欣赏墙内的光亮,庆祝节日的到来。这幅颇具工业化风格的场景,被染上生活的气息。

昔日的上海郊区江湾,遍布厂房。1951年上海市政府规划9个住宅基地,先后建造了曹杨新村、长白新村等18个工人新村。控江新村,也在当时应运而生。相比老式石库门的狭小居住空间,控江新村的房间虽然不大,但有相对独立的厨卫设施,小区内整洁的花园和新栽的小树。原先住在虹口区明华坊的黄昱宁外婆一家,将家里的房子调换到控江新村。1975年,黄昱宁在这里出生。

几年后,改革开放。国门打开,计划经济年代进入尾声。浪潮袭来,影响了整个城市,影响了产业工人的生活,也影响了生活在工人新村的黄昱宁。她所熟悉的这一方上海,如被大雨涨满的池塘,溢出的水流漫延向前,和其他区域的上海融合在了一起,汇成了一个新上海。

阵阵新风扑面。城里涌动着渴望改变的气息。外婆去香港探亲,回家后为黄昱宁带来小小的金坠子、米老鼠图案的运动套装、随身听、自动照相机、邓丽君的唱片……原来,控江新村外有一个上海,上海外有一个香港,香港外有一个世界。



黄昱宁,1975年出生于上海,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、编审,《外国文艺》杂志主编。译有《甜牙》《追日》《在切慕海滩上》等,译著近三百万字。



控江新村位置图



控江四村 邵竞摄

## 新村里的书柜

在工人新村建成之前,上世纪50年代,许多沪东地区的工人住在阁楼、亭子间、草棚子里,甚至于住在破船上。能住进整齐有煤卫设施的新村,不仅居住条件改善,而且更觉得尊严。不过,工人新村的住户也不全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。黄昱宁的外祖母毫无重男轻女的偏见,看见长女读书优异,毅然供她去大学深造。等到长女结婚,又一直和长女生活在一起。因此,从黄昱宁记事起,小时候的控江新村,是个外婆当家做主、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母亲社会。

黄昱宁的母亲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,与大学同学结婚。当时,毕业听从分配,母亲去上海仪表局下属工厂担任技术翻译。父亲因为是广东人,被分配回原籍工作,只能在节假日和寒暑假回上海与妻女团聚。但即便每年相逢的日子短暂,黄昱宁的父亲还是在控江新村的小房间里打造了一具书柜。为了做好书柜,他每次回上海,还会特意带来些广东的板材。一块木头一块木头彼此咬合。这具最终由父母精心打造成的书柜,是在黄昱宁的记忆里,同龄人和邻居家里从未出现的家具。书柜里如此大的藏书规模,也是同龄人和邻居家里从未有过的风景。

在工人新村的知识分子家庭里,黄昱宁几乎是自然而然长成了一个读书种子。她在游戏玩耍项目上显得笨拙,但对于读书却始终乐在其中。

放下书本的时候,父母会带她往五角场方向散步,穿过几条大马路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?离开控江新村不过15分钟步行之外的世界,当时还是一片郊野。今日车水马龙的五角场商圈周边,当时有过人头高的芦苇、野草,刺猬和黄鼠狼出没其间,小黄昱宁在父母背后好奇地伸出手去,能看见当地农

人养着的猪。这个尚未被城市化的地方,显露出一股未被驯服的野生感,叫小女孩觉得好奇也畏惧。她更不常出门闲逛了。穿越大马路如一项可惧的挑战,让她心里隐隐有不安。她把头埋在书本里。

## 洼地之变

1985年8月1日,上海暴雨,9200多户居民家中进水,最深的达80厘米。其中,控江路、延吉路之间的双阳路周围一片汪洋,积水深度平均达到50厘米。控江地区由于地势低洼,加之近年来新村规模不断扩大,相应的排水系统没有跟上,一场大雨过后,2千多户居民家中进水受淹。黄昱宁还依稀记得,外公在他们一楼房间外的天井里,种植的蔷薇、枇杷、丝瓜藤都被大水淹没岌岌可危,平日圈养的几只鸭子,此时高兴地在积水里游起泳来。

次日的《解放日报》记载了发大水当天中午,市领导涉水到控江地区察看马路积水情况,还到控江三村看望慰问了住户进水居民。得知此地正在新修下水道工程时,市领导要求防汛指挥部的领导“要把防汛排涝工作,作为重点抓,这方面的工程要迅速上马,该花钱的地方一定要舍得花。”

这年9月26日,作为本市居民住宅区的一项大规模排水工程,控江地区排水工程启动。这也意味着,这一地区八万多居民在日后汛期到来时,将免受水淹之苦。

## 门外的世界

和新修的排水工程一起来到控江新村的,还有外婆失散多年的兄弟,黄昱宁的舅公。

1983年的一个下午,一个戴着鸭舌帽、穿着当时上海鲜见的格子夹克衫的老头,走进黄昱宁家。原来,外婆家的舅丁,新中国成立前都承父业担任太古轮船上的船员。1949年太古关闭了上海办事处,舅公就跟着公司去了香港,几年后与上海的家人断了音讯。

几十年后,这位舅公的忽然出现,似乎忽然打开了控江新村面向外部世界的窗口。原本,黄昱宁所有的亲戚都住在控江新村周边,她在附近上小学,走亲戚,几乎从不涉足控江地区以外的地方。舅公和他家人的陆续来访,让黄昱宁有机会陪着客人到了“另一个上海”——一个由外滩、东风饭店、大世界构成的上海,一个更常被影视作品描述也更为外地游客熟悉的上海。

她陪着大人们挤公交、坐出租车,见识这些于香港游客是重温故地、于她这个上海人却是新鲜事物的场景。她听着饭桌上阿姨舅舅们热烈讨论着换外币、经济担保、出国等等词汇。

阵阵新风扑面。城里涌动着渴望改变的气息。外婆去香港探亲,回家后为黄昱宁带来小小的金坠子、米老鼠图案的运动套装、随身听、自动照相机、邓丽君的唱片……原来,控江新村外有一个上海,上海外有一个香港,香港外有一个世界。

和亲戚们的观念一起发生改变,还有母亲的工作环境。原本母亲在厂里担任技术翻译,每日的生活平平无奇。骤然之间,外宾来访,海外交流频繁,母亲不仅需要案头翻译,还要为厂里的外事工作担任口译。参与到接待外宾的工作,让母亲最后几年的工作生涯变得丰富灿烂、眼界大开。这种内心的小小优越感一路升高,直到整个城市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,工厂效益下滑,工人们开始下岗。

终于有一天,母亲对当时已经调到上海一所中专任教的父亲感慨:还是做老师好。

多多少少受时代风潮的影响,黄昱宁在高中毕业后升入上海外国语学院。全家也搬离了控江新村。在大学里,黄昱宁遇到不少上海“上只角”出身的同学,这些格致中学、向明中学、位育中学毕业的学生,和黄昱宁说着一模一样的上海话,但对上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。

他们熟悉的陌陌交错的弄堂、沿街琳琅满目的小店、商业街的繁华和热闹,于黄昱宁而言,都是陌生的。黄昱宁熟悉的规整的新村住房,曾经探险过的农民猪圈、宽敞的中小学校园,对住在闹市区习惯了逼仄环境的同学们而言,也是陌生的。

黄昱宁进入大学的上世纪90年代,上海开始进入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,区域之间的差异被缩小抹平,但很多年后,黄昱宁还是有点害怕过大马路,她做梦回旧居,梦到这间位于控江四村底楼的小屋,梦里的空气总是潮潮的,梦里的水门汀地板总是湿漉漉的。

## 腌笃鲜

### 杨浦区的工业往事

杨浦区近代工业始于19世纪80年代,清光绪八年(1882年)集资15万银两,经李鸿章批准,开办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造纸局;清光绪九年英商在杨树浦路建立上海最大的自来水厂;清光绪十六年,经李鸿章批准,集资50万两开办了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,这是国内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。

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外商在华设厂呈合法化。因区域在黄浦江下游,沿江大量滩地地价低廉,沿江已建有杨树浦路,与租界中心区相通,交通便利,从1902年至1937年,外商相继涌进租界办厂。日商七大纺织财团,开办了裕丰、大康、公大等17家纺织厂,4家冶金厂;英商先后办了马勒等造船厂3家,怡和等纺织厂6家,中国肥皂公司、英美烟厂以及正广和汽水厂等轻工业厂14家等;美德等商人共开办了10家工厂。

20世纪20-30年代,民族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,新建的有荣氏家族的申新第五、第六、第七棉纺织厂;郭氏永安系统的永安第一棉纺织厂;在电子和机器行业中,建立了亚浦耳灯泡厂和益中机器股份有限公司,以及闸北发电厂、正泰橡胶厂、中华造船厂、中国毛毡厂等。至1937年,租界民族工业已发展到301家,其中轻纺工业已具相当规模,纺锭数占全市45.4%。随着抗日战争爆发,租界民族工业受到很大损失,大多数被日军侵占,工业生产萎缩,工人大量失业。

1949年5月,上海解放,工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,工业生产飞跃发展。据1959年原杨浦区统计,从1949-1959年7月,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共134569.89万元,1958年工业总产值275739万元,为1949年的9.73倍。1960年,区属街道工业开始崛起,到1965年,新建工厂84家,新迁入厂有东风机器厂等23家,小厂合并组建的有上海自行车三厂等48家,工业总产值61.35亿元,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6.52%。

196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工业生产一度下降,1971年底才逐渐恢复上升。1978年后,实行改革开放,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。在转轨过程中,老工业基地获得新机遇,也遇到了严峻挑战。1989年以后,采取国家、企业、银行贷款等多种形式,投资20.0258亿元,引进国外先进技术、设备216项;新建中外合资企业66家,总投资为14259.7万美元,外方占34.7%。产品升级换代,外贸出口迅速增长,1990年出口产值23.15亿元,创汇3.06亿美元。其中区属工业总公司出口产值6亿元,为全市地区工业之首。随着产品升级换代,老产品逐渐向内地扩散,共兴办联营厂388家,产品有钢材、机电等。

(摘自《杨浦区志》)



## 上海美冠塔诺金口腔门诊

口腔颌面外科专业、口腔黏膜病专业  
口腔修复专业、牙周病专业、牙体牙髓病专业



爱牙热线: 021-63860128 021-63860155  
地址: 黄浦区九江路675号长江新能源大厦2楼 (人民广场分院)

## 把旧居腾给群众住

凌晨2时,中共宁乡县委的同志把文件稿送到刘少奇住处。正在工作的刘少奇连忙放下别的东西,接过文件稿审阅修改,一直到黎明才改完,然后他给县委副书记何长友写了个便信:“何长友同志:此件我作了一些修改,是否妥当?请酌定。此件是否印发或在电话会上通知各公社、各大队?也请你酌定。又,此件应立即报告省委。”

第二天,这个文件就在县委传达贯彻了。接着,中共湖南省委也向全省转发了这个文件。文件执行后,一大批被公家平调的房屋退赔给了农民,对社员之间互相挤占也规定了调解办法,总算使当地群众基本上都有了安定的住处。

刘少奇还指示把他在炭子冲的旧居腾出来让给群众住。他不满意地说:“这里搞我的旧居纪念馆,曾写信问过我,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,结果还是搞了。”随即他在炭子冲的社员会上当众宣布:“纪念馆不办了,这个房子退出来,分几户社员进来住,这些门板,拿去替没有门的人家做门。”

他点了几个社员的名,嘱咐他们赶紧搬进来住,说:“社员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、20年,等到了比这个更好的房子,愿意搬再搬。”

刘少奇在宁乡县农村住了11天。5月11日,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,报告他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,并对解决社员住房,退赔社员财物,巩固国家、集体和个人所有制,在部分乡村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等一些农村带有普遍性的



## 风雨历程 晚年刘少奇

黄峥 著

问题,提出了处理意见。

5月15日,刘少奇离开长沙返回北京,结束了历时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。

回到北京,他正赶上出席5月21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。从会上反映的情况看,党内外思想仍然相当混乱,集中表现在对形势的看法上。一部分同志坚持困难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,还有的自批彭德怀有余悸尚存,不敢讲真话。亲眼看到老百姓的生活这样苦,还有什么犹豫的呢?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大声疾呼:“农民饿了一两年饭,害了一点浮肿病,死了一些人,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,全党、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。回过头来考虑考虑,总结经验,我看是时候了,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。”

他还果敢地推倒了“经济困难是因为自然灾害”“成绩九个指头缺点一个指头”的公式套话,在会上提出:

这几年发生的问题,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,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?湖南农民有一句话,他们说是:“三分天灾,七分人祸。”……在大多数地方,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。有的同志讲,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。

现在看来恐怕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。总是九个指头,一个指头,这个比例关系不变,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。

他反问道:“如果不是严重问题,为什么会这样减产?为什么要后退?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?说到责任,中央负主要责任,我们大家负责。”

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,终于在贯彻八字方针方面迈出了一大步。刘少奇总结会议精神说:“中心的问题,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,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,压缩城市人口下乡。”会议最后决定,当年就要下放1000万城镇人口,钢产量也要进一步压缩。会上还决定对“反右倾”等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共产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。

毛泽东在6月12日的大会讲话中,特意向大家介绍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。还说:“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,亲自去做调查。”毛泽东的又一次提倡,使全党的调查研究之风再度兴起,大批领导干部在会议结束后,打起背包、轻装简从下了基层。

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方针的指引下,1961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有所进展。

钢、煤产量和基本建设都有较大压缩,关停、并、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达25000个,回笼了几十亿元货币。由于放散了1000万城镇人口,使城市和乡村、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得到初步调整。

兴安岭森林,树木茂盛,林深如海。一支小小的考察队伍,正沿着丛林中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行进着。他们个个穿戴着硬邦邦的雨衣、雨帽和笨重的高腰雨靴,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观察边前进。

这是刘少奇为解决国家森林资源开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,在兴安岭林区实地考察。时间是1961年7月。

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、小兴安岭,覆盖着大片的原始森林,是国家主要林产区。但是,长期以来林业工作问题不少:采伐和培育比例失调,育林跟不上采伐,欠账越来越多,森林资源浪费很大。刘少奇觉得这些问题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。他说:林区工作很重要,但是历来很少有中央领导同志去那里深入了解情况;我国森林资源很丰富,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,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。”

本来刘少奇准备1961年上半年去林区,后因广州会议和湖南调查,拖了下来。正好7月份在哈尔滨召开全国林业工作会议,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也一再希望他去林区视察,所以刘少奇在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和处理完一些紧迫工作之后,就赶到了东北。

7月20日,刘少奇带领林业部负责同志和林业专家周重光教授,离开哈尔滨,乘一列森林小火车进入了小兴安岭林区。小火车钻进茫茫林海,开开停停。在小兴安岭林区的日子里,这列小火车既是刘少奇和随行人员办公、开座谈会的流动工作室,又是他们吃饭、住宿的临时宿舍。